

东南亚历史译丛



DONGNANYA  
LISHI YICONG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

1979

1

# 东南亚历史译丛

(第一集)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

# 目 录

- 东南亚历史的整体性……………〔英〕D·G·E·霍尔(1)
- 东南亚早期历史的研究的最近动向(摘记与评论)  
……………〔英〕D·G·E·霍尔(19)
- 帝国主义的巧言和近代的历史编纂学:被征服前后的  
下缅甸……………迈克尔·阿德斯(35)
- 关于《真腊风土记》中出现的柬埔寨语  
……………〔日〕高桥保(67)
- 关于泰国的地租改革……………〔日〕北原淳(92)
- 高利贷资本——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殖民掠夺  
缅甸农民的工具……………〔苏〕阿·普·穆兰诺娃(135)
- 殖民制度的遗迹——越南与柬埔寨的边界  
……………〔日〕菊池一雅(171)
- 一九六七——一九七七年日本研究东南亚历史的概况  
……………(183)
- 柬埔寨历史简编……………〔柬〕梁合安(205)

# 东南亚历史的整体性\*

D·G·E·霍尔

几周前，当康奈尔讨论会结束时，一位研究者谈及研究东南亚历史的巨大困难，这个地区幅员广阔，实际上又包括如此众多的不同的国家。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我要说明他们都是同属于东南亚的。我还要说：“假使你抽去各个不同国家的固有的特点，而将他们都打扮得一模一样时，那么你不但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认识每个国家的起源，而且也很难认识整个东南亚的起源”。

东南亚是由什么组成的？这里无需向一位提出这个问题的读者讲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东南亚指挥部的建立，不但使之明显地突出起来，而且赋予了其自身固有的同一性。也许，这一点过去从未被人们所认识。当我继续谈及东南亚包括印度以东与中国以南的广大半岛，以及位于以苏门答腊、新几内亚以及菲律宾为顶点而构成的巨大的三角形内的一个海岛世界时，我回想起当我第一次从地图册上认识它，那时并不称为东南亚，它的大陆部分称为外印度，或印度支那半岛，而海岛部分除菲律宾之外，则通称为印度群岛。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我在新成立的仰光大学讲授历史时，缅甸还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此外，当时荷兰人称其东方帝国为荷属印度。他们称印度次大陆为“东印度”或译为“近印度”。后当一九四九年荷属印度独立时，取名为“印

度尼西亚”即“印度群岛”，即仍然保持其将此地区称为印度的错误概念。

此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印度成立了一个团体，名曰大印度协会，大概是模仿古典希腊和大希腊把整个地中海世界当作其殖民地那样，该组织也把大部分东南亚都称为大印度。一九五一年，其会员之一，H·G·夸里思·威尔斯博士（Dr·H·G·Quaritch Wales）出版了一本关于东南亚早期历史的书，其书名就称为《大印度的形成》。

已故的乔治·戈岱司（George Coede's）用较温和的方式表达了印度人的此一主张。他写的关于包括前十五个世纪东南亚历史的整体性的先驱性著作（一九四八年与一九六四年的版本），即名为《印度支那与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Les 'Etats hindouises d'Indochine et d'Indonesie）。其主题就是东南亚的印度化。他把印度文化在东南亚的扩张，作为一个运动加以理解。因此，在讨论东南亚历史的整体性时，它的同一性问题就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用自己的名字存在着，或是其中的一部分应划为印度殖民地，另一部分带有中国型文化的即越南应划为中国殖民地，而菲律宾则是否应划为美国殖民地？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自太平洋战争结束以来，大部分学者都接受“东南亚”这一名词作为此一研究领域的通用的同一概念，在大量的出版物中已加以使用，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已没有多少疑问。

一九四九年，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成立一个独立的东南亚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一名称上，加上了“及其岛屿”的字样。这就表明，它把太平洋岛群，尤其是波利尼西亚的语言和文化也包括入其研究的范围之内。出于同样的理由，当然也可以把台湾、新西兰与马达加斯加包括进去，因为

这些地方也是使用东南亚语言的人们的家乡。但根据明显的理由，这些地方并非属于东南亚。

一九六四年，伦敦大学费希尔（Charles A. Fisher）教授写了一本在这个问题上饶有意味的东南亚地理著作，即《东南亚——社会、经济、政治地理》一书。此书范围非常广泛，其叙述足可誉之为“东南亚政治家手册”。作者把这一地区描写成为世界的一个伟大的边缘地带，一个在季候风陆地这一较大整体中的特殊的地区。他特别注意研究在当地广大人口中占最大多数的低地人民的文化的一致性，并注意研究它们在体质上和精神上的特点的普遍共同性。他还进一步认为东南亚比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未明确的边界地带更为广大。它确是一个有其本身特点的地区。事实上，我们对外印度和印度群岛时代的研究是不能过于匆忙，因而只能指望提出一些疑问而已。正因为这样，我需要解释“东南亚研究”这个题目，这是由大卫·斯坦伯格（David Steinberg）及其合作者于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东南亚近代史中的一个题目。关于东南亚这一概念的探索工作已由罗素·法菲尔德（Russell Fifield）所承担。大卫·怀亚特（David Wyatt）是斯坦伯格考察“现代东南亚的整体”问题的合作者之一，我承认正是他向我提出这篇文章的题目，正如他们在其序言中所叙述的那样。

我对这个建议的第一个反应是感到这个工作的艰巨性。我曾怀疑过下述的想法是否明智，即把东南亚历史的整体性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克制其不致深陷其中。我回忆起波拉德（A. F. Pollard）对于英国十六、十七世纪的宪法的机敏的诡辩，他说都铎王朝之所以成功是由于自认他们的权力是理所当然的，并明智地不加以限制。而另一方面斯图亚特王

朝则设法限制之，结果却引起了两次革命。但是，我发现我自己对东南亚历史的整体性问题越来越感兴趣。它们是结合在一起的吗？不同的分子能够构成一个整体吗？但是，我终于被诱惑所屈服而着手去解决这个问题。

东南亚历史在东南亚著作者手中有着大量有关一个朝代或一个国家的过去的遗产。按其政治观念来说，它的首都就是宇宙的中心，就像寓言中的梅鲁山为中心的印度教宇宙天体图一样的展示。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继后的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打进这个闭关自守的国家集团时，他们的著作提供了一个较广阔的远景，但主要是致力于描绘他们的开发。后来，直至十九世纪，当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已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时，他们才开始分别去发掘各个地区的考古、人种、历史和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在荷兰人和法国人看来，这些工作是一种高级专业性的职业。不同的是，荷兰倾向于注重荷属印度，而法国则以其河内远东博古学院为基地，开展包括大部分东亚地区的研究计划工作。

因此，首先要像卓越的河内学院的成员乔治·戈岱司本来已经做过的那样去探讨东南亚的历史，这样做是恰当的。他曾写过两本关于此一题目的书籍。第一本我已经提及其法文的书名。此书现已译成英文，名为《印度支那与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The Hinduized States of Indo-china and Indonesia)。这本书并未包括整个东南亚，只是涉及到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区域，实际上是指“大印度”。他把菲律宾与越南略去，认为这些国家在他的主题范围之外。这本书对公历开头的十五个世纪的印度化国家进行了严密而完整的叙述。

戈岱司把这些国家描绘成为共同文化的所有者。首先是

从其史前时代便继承了水稻的耕种和它赖以生存所必须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社会中妇女居于高位，男女双方都有继承权，这与印度和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们的宗教是泛神论与祖先崇拜的混合体。丰收祭祀与土地神有关。巨石在祭礼中起着显著的作用。神龛放在山上或高处。

印度化更进一步使之增加了新的特点，尤其是使他们有了君主专制的提婆罗阇观念，在理论上神君可以废除风俗习惯。由于印度化，引来了有关国家及其组织的印度教——佛教观念，引来了达摩的法律观念，尤其是庙山被置于最高的位置，国王被奉献为湿婆、毗湿奴以及活佛的化身。随着印度教与佛教的传入，他们的古典语言即梵文与巴利文及其文学亦接踵而至。早期东南亚戏剧、舞蹈与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主题都是从伟大的印度经典作品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等梵文记叙诗中引申而来的。

至于戈岱司过高地估计的印度在整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成果的印度性问题，在这里与我们无关。但他所完成的与我们有关的东西是印度化提供一个极好的手段使东南亚各国的历史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他所提出的对印度化国家逐个阶段进行比较的观点，即把这些国家看作为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这种处理方法有其不足之处：他把一些国家的某个时期的历史割裂为不适宜的一小段，但在理解某些事件的发生上，以及我们对时间因素的掌握上，总的收获还是巨大的。

在后一部论著中，戈岱司阐述了当在土著阶层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印度的上层建筑时，在文化领域内所发生的事情。

可能有人怀疑，他是否低估了印度化之前的东南亚文化



的力量和持续性。就我而言，我认为在其结构中既有一个土著的基础和土著的上层建筑，但在其组成之中也有印度的因素。

戈岱司第二部论述东南亚历史的著作，名叫《印度支那半岛的民族》(Les Peuples de la Peninsula d'Indochine)。该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六年的英译本用一个使人迷惑的但可能是意味深长的名称，即《东南亚的形成》(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该书的范围已由其法文书名正确地表达出来了。它虽只涉及半岛，但又非整个半岛，并为此而删去了马来亚。另一方面，该书包括越南历史，并将其作为东南亚历史整体的一个部分。与其前著不同，此书并未截止于十六世纪初期，而一直研究到二十世纪。

在此书中，他作了一个重要的声明，即将东南亚看作是一个整体。因此，他强调指出当真正的东南亚形成时，最重要的是必须了解其早期的历史。欧洲人及其绝对统治权建立之前情况已开始复杂化了，这引起了西方历史学家的重大关注。他提醒说：这些加之于东南亚的活动的效果被过分夸大了。他抱怨说，公元后开始的十五个世纪的东南亚历史似乎被看作是五个继承一个的一段单纯的前言。他坚持认为东南亚的真正危机不是起源于十六世纪的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到来，而应回溯到十三世纪梵文文化的衰退、上座部佛教(Theravada Buddhism)的传播与蒙古人的入侵，直接或间接地招致了政治地理的巨大变动。

总之，如戈岱司所断言，十三世纪出现的东南亚命运中的危机，正是东南亚历史的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在较早的年代里，已经看到了东南亚印度化国家的艺术和建筑术上最后

的绚丽的样本，如中缅甸的蒲甘与柬埔寨的吴哥，这些人类艺术天才的异彩，早已在七世纪的占婆与八世纪的爪哇表现出来，这时却突然终止了。爪哇在九世纪、吴哥与蒲甘在十二世纪达到了全盛。关于吴哥，菲利普·格罗斯里埃（Philippe Groslier）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规模类似的艺术与建筑术能与之匹敌。戈顿·鲁斯（Gordon Luce）在其《杰作，古代的缅甸，早期的蒲甘》（Magnum, Old Burma, Early Pagan）（一九六九—一七〇）一书中也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蒲甘的寺庙堪与吴哥所能表现的最好的艺术比美。

蒙古的入侵在不同的方面影响了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唯有菲律宾例外。他们引起了两个最强的国家，即分别控制整个缅甸与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的蒲甘与新哈萨利（Singhasari）的衰落。越南和占也被迫暂时停止了他们之间持续多年的争端，而共同去反抗侵略者。这个斗争进行得很成功，虽然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使人民遭到很大的苦难。

由于蒙古的入侵而带来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却使在二、三世纪前迁徙而来的泰国得到在东南亚地区维护其主权的会。这些地区，即伊洛瓦底江上流河谷与亲敦河河谷，其最大支流——湄南河与湄公河的上游地区，对以后的东南亚历史曾起过极其巨大的影响。十三、十四世纪，泰人在建立了用中文命名的暹王国，以及控制湄公河上、中游的朗勃拉帮王国的半岛事务中成为主要的因素。缅甸人把居住在缅甸与云南南部山区的人们，称为“掸人”。当蒲甘于一二八七年衰落之后的两个多世纪中，他们为控制北缅甸和中缅甸曾与缅甸人进行竞争，直至十六世纪中叶，缅甸人才再次成为他们家园的主人。

十四世纪时，以阿瑜陀耶为首都的暹罗王国以吴哥帝国的西部地区发生事件为理由开始全面进攻该帝国的其余部分。根据现存资料的新的解释，他们于一三六六与一三八九年曾两次夺取其城市，但未能得以固守。

我们再回到十三世纪，在该世纪的最后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泰族已将其对马来半岛的统治推进到最南端，从而清除了当时以苏门答腊的占碑与巨港为基地的海上帝国室利佛逝对狭长海峡统治权力的最后遗迹。这样一来泰族就为其在东南亚的早期事业，提供了一个扩展势力的普遍因素。暹罗从而进入了缅甸、柬埔寨、马来亚、苏门答腊，甚至越南的历史。

马可波罗于一二九二年，从元朝的中国经海路回国，进入苏门答腊巴利克港时，曾写到：该地人民正开始信奉穆汗默德先知的教规。他的记载弄清了马来亚世界伊斯兰化最早的情况。在以后两个世纪里，现在印尼的大部分，整个马来半岛、婆罗洲沿岸的大部分、苏禄群岛及其北部以及棉兰老菲律宾大岛都归入伊斯兰教圈内。另一方面，印度支那大陆的伊斯兰教在对抗清教徒式的锡兰型的上座部佛教则未取得任何进展。上座部佛教要求缅甸、暹罗、柬埔寨与清迈和朗勃拉邦的各个老挝人王国都皈依之。十三世纪末期，上座部佛教已牢固地移植到这些严密封锁的国家里。其信奉者看来是坚决反对伊斯兰教的，就像他们后来反对基督教一样。

东南亚的统治者与中国皇朝之间成长起来的关系，为该地区历史的整体化提供进一步的因素。向中国派遣使团的做法可以追溯到这个地区政治权力发展的最早时期。沃尔特斯（O·W·Wolters）教授在其《早期的印尼商业与室利佛逝的开发》一书中所描述的就是公元五世纪印度尼西亚的统

治者派遣使团去中国的情况。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似乎是显示他们作为一个地区君主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並谋求中国皇帝对他的正式承认。南洋各个重要国家都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关系，他们的统治者派出携带礼品的使团。这些礼品包括本国物产的样本和在皇帝面前演出的音乐家与舞蹈家的团体等。中国皇帝的御前大臣白居易在其著名的《骠国乐》一诗中就曾描写公元八〇二年唐朝时来自缅甸音乐家与舞蹈家表演的情景。

中国把东南亚使团送来的礼品记载为贡品。东南亚则认为这些礼物的意义主要在经济上而不是在政治上。在早期，这是他们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唯一途经。而中国船只则很少远航南洋，正当的贸易只通过进贡的使团来进行。此外当中国送回一些礼物作为对他们的进贡的一种答谢时，这些礼物成为南洋各国获取巨大利润的一种来源，因为其价值往往超过其贡品。必须提到的是，当时东南亚各国的统治者就是该国的最大的商人。

此后，十二世纪，南宋开放了海上贸易，并允许中国商船与东南亚各港口进行直接贸易而引起 的中国海上贸易的扩展，这使马来亚室利佛逝商业帝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自七世纪以来，该帝国一直统治着经过其狭窄海峡的国际贸易，而这时已不能再维持其垄断地位了；同时，一方面在泰人压力下，另方面由于爪哇海上力量的扩张，这个海上帝国终于在十三世纪末期被消灭了。而爪哇满者伯夷帝国则声称其宗主权包括它的苏门答腊基地。

在中国，元朝被推翻之后，明朝取而代之。明太祖洪武皇帝（一三六八——一三九五年）不准私人远航南洋，並恢复了进贡制度。他邀请室利佛逝各港口前来进贡，但已为时过

迟。当中国的使臣出示邀请的信件时，爪哇人绑架並杀害了他们，当然，爪哇人自己的港口也遭到了可怕的惩罚。

与蒙古人的侵略一样，明朝初期企图维护和宣扬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以构成其历史中有意义的篇章。那就是武装干涉缅甸与越南，以及众所周知的永乐帝派遣海军将领郑和率领舰队进入南洋並削平叛乱的惊人壮举。及当爪哇人破坏了苏门答腊的巨港，该地的逃亡王室在马六甲重新建立了室利佛逝的国家之后，由于明朝对早期的泰人施加压力才使其有可能得救而免遭灭亡于泰人之手。此事本身对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有决定性的影响。从此以后马六甲就成了传播伊斯兰教的中心。明朝虽竭力宣称其对东南亚的有效的领导作用，但不久这种作用已消声匿迹。从此，中国对该地区的事务就再也无法发挥重大作用。

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缅甸、暹罗、柬埔寨与朗勃拉邦、万象、清迈等老族人国家的历史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这主要是由于这些王国的创建者的野心，其次则是由于文化的交流。缅甸征服富饶的白古的猛族国家，并将首都南迁至白古城，企图削弱泰族的优势。在十六世纪下半期，他首先征服了原属其本国的掸国，后又企图征服其他所有的泰族国家。缅甸武王莽应龙（Bayinnaung）（一五五一——一五八一年）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征伐，但后来引起了各国特别是暹罗的抵抗运动，使缅甸人遭受了严重的失败与损伤，以致到十七世纪时，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境地了。

吉篾的入侵，使胜利了的暹罗在其可怕的困境中又重遭苦难，因而转向征服柬埔寨。但其保持柬埔寨从属地位的努力，在该世纪中叶后不久，却引来了另一个也企图占有吉篾土地的竞争者即率领越南人渗入湄公河三角洲肥沃土地的顺

化阮氏家族。

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期，这两个国家的争夺，由于双方都发生了重大的事件而中止下来。暹罗为保卫她真正的生存，要再次抵御缅甸人的一系列的猛烈进攻，而越南南部则成了持久而耗尽精力的内战即有名的西山叛乱的牺牲品。后来一个新的暹罗与一个新的越南又出现在其废墟上。一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即法国到来之前，他们又恢复了争夺。他们都企图在柬埔寨的其余部分建立保护国，这样一来，无意中使这个不幸的国家总算维持住了它的完整。

现在，越南人在东南亚舞台上，已形成为决定性的力量。现在是对越南历史在东南亚地区的整体性的要求给予重视的时候了。当历史学家首次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处在中国的统治之下，这种情况持续达千年之久。从公元前一一一年到公元九三九年，越南不仅被中国人殖民化，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还受到了中国的同化。他们的国名“南方人”就是中国人适应他们的语言而命名的。在中国人看来，他们不象其他东南亚人那样野蛮，是属于那些被中国人称为“昆仑”的人。

公元九三九年，当越南提出政治上独立的要求时，中国从未正式同意其分立，虽然中国皇帝于九七零年曾给予其新国家以正式的承认。但依次到宋朝、元蒙忽必烈、明朝，一直到最后十八世纪后期满洲人统治时，中国都曾企图重新征服并占领越南。明朝曾接近成功，已占领了东京。并于十五世纪初期曾多少勉强统治了二十余年。但越南人一直顽强地维护其独立，当时他所采取的方法，就很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他们对付其最初的法国主人以及其后的美国解放者那样。

从九三九年起，越南的历史已更加紧密地与东南亚结合

在一起了，这一点是多么令人瞩目啊！首先是他继承了在其独立前就已进行的与印度化国家占婆的斗争。该国占据着现今顺化南部的沿海狭长地带，并将其势力向南扩张到藩朗地区（这一名字是模仿当时古梵文的藩都朗加而来的）。占国的统治阶级于公元后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曾采纳印度的梵文文化，他们的曾一度辉煌的圣城遗址以及湿婆教与佛教都被热心的法国考古学家从湮没中抢救了出来，并在今天已成为它们的创造者的高度文化成就的见证。

许多法国学者认为：占——越斗争主要是标志着两种竞争的文化，即中国化与印度化之间的斗争，这在东南亚历史上是一场漫长持久的斗争。它们之间的斗争一直继续到十五世纪后期占王国最后被推翻时为止。随后越南占领了占王国，最后到十七世纪末叶及十八世纪还占领了半岛最南端的地区。顺便提一下，越南与暹罗的斗争并不只是为了占领柬埔寨，而且还为了占领万象和朗勃拉邦的老挝人王国。当暹罗人于一七六七年从缅甸人手里收回阿瑜陀耶之后，就建立了对老挝的宗主权。很久以后，正是法国人从这种局势中得到了好处。他们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征服东京之后，利用越南人想收回两个老挝人的国家的请求而迫使暹罗把老挝割让给越南，臭名昭著的一八九三年北榄事件之后，法国人以保护国的名义把他们夺取了过来。

再转过来谈谈越南在东南亚推行扩张主义的主题。它的历史表明，它不单只寻找广泛的政治控制，而且企图在其俘获物上打上越南的文化烙印。法国历史学家创造了一个动词“越南化”以说明这个过程。越南人甚至改变了这地区的地理术语，用越南语来代替以前使用的术语。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他们在为占领柬埔寨而与暹罗的残酷斗争

中，把越南的名称强加于柬埔寨的全部政治与行政部门。

越南的扩张并非一个持续的过程。有时由于受到国内动乱与衰退的影响而长期处于停顿状态，但越南人从未放弃这一打算，就好像水总是要往低处流一样。而当其前进的道路受到阻碍时，越南人只是暂时地停顿一下，一直到他找到足够的力量绕过或推开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时为止。一本标准的关于越南人民的历史著作《越南的历史和文明》(Le Vietnam,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的作者黎成奎(Lê Thanh Khoi)写道：“南进”(Nam-tien)是越南历史的组成部分。

虽然扩张主义是越南结合于东南亚历史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但绝不是唯一的因素。早在公元四世纪，从其与中国人统治的斗争中产生的民族主义，也迫使他们去保持和维护他们本身的特性。这样，虽然中国人把他们的政治思想与行政方法提供给他们；虽然越南独立之后很久，中文还长期保留在官方语言之中，在增补官员时只根据孔子的经典来考试；即使主要的越南文学作品在独立后很久还继续用中文来写作，然而他们的作品与中国的原型总有些微妙的差别。其文学作品完全是有越南文的特点，并在适当的时候，越南学者用与其含义相适应的中国文字把他们的民族语言变成文学作品，他们的这样做，没有被任何中国人所识破。这样，越南人的较高的文化，虽然首先是来自中国人，但却打上了一个清楚的越南的印记，并随着几个世纪的流逝，更增强了其越南的成分。

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越南人脱离了“中国”并转向南方，他们以后的历史就与其东南亚邻居交织在一起了。虽然这样，但是他们的统治者还是按礼节照例向中国皇帝呈送礼



品，并谋求他们的承认。而中国皇帝也向他们回赠印信和授予爵位，并将他们使团的到来作为效忠和纳贡的表现而正式载入史册。越南统治者本身也认为这样做与他们警惕地维护其政治独立毫不相悖。大概其他东南亚的统治者也一样，在他们看来，如果这不是一种独立的保证的话，也是一种示威。他们并采用了一个欧洲人通常译为“皇帝”的头衔。

我们意识到，越南与中国的关系较之其他也向中国派遣使团的东南亚王国的关系多少较为密切。当存在两个正在冲突的王位争夺者时，中国人承认与否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八〇二年，经过长期的争夺之后，嘉隆皇帝的在首次将南方殖民化后，建立了一个以他本人为统治者的越南之后，他急忙向中国报告他的登极，并请求给予承认。过若干年后，其后裔嗣德（Tu Due）由于东京的混乱局面和法国要干涉此事的威吓，他甚至以名义上承认中国皇帝的统治权为代价来寻求中国的援助。结果，一八八三年，当越南皇帝协和（Hiep Hoa）在法国人的逼迫下签署正式声明而接受法国保护时，中国曾提出强烈抗议，理由是协和是在其宗主权统治之下。中国还曾以同样的理由于一八八五年抗议英国进军曼德勒和废黜锡袍皇帝。然而这些事例告诉我们的多是关于清朝对待东南亚的态度，而很少是关于东南亚的统治者对待中国的态度。例如，当英国要求锡袍的大臣们明确表示过去与中国的关系时，他们毫不妥协地回答说：缅甸从未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以朝贡的形式向中国送过任何物品。当然，这忠实地代表了东南亚对此种关系的观点。

当我一九四九年在伦敦大学被任命主持东南亚历史讲座时，关于将菲律宾包括进东南亚历史的问题，对我来说似乎还有疑问。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很少知道十六世纪被西班牙征